

我所接触过的人们

与毛泽东同志在一张餐桌 (访谈录)

出于我们的意料，今天这位经济学家没有涉及什么理论问题，而是轻松地叙述了他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些回忆。

访问人 去延安的时候 您还是个青年吧 对毛泽东 有深刻的印象吗？

于光远 我于 1939 年 7 月下旬到延安。印象深的是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1939 年 12 月 9 日那一天 举行了“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纪念会 时间是在晚上 会场设在中央大礼堂 也就是后来毛泽东作整风报告的那个礼堂。在我参加到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中来的时候 划时代的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了 虽然党的那一段历史我们并不知晓，但是都知道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威望在我这样的青年党员的心目中是绝对高的。还是在抗战前的北平 只要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解放》周刊上的文章，没有一篇我不细心阅读。后来我又在武汉《新华日报》上读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些著作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机智的语言更加强了毛泽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那天我听说他会出席这个青年的集会 将要发表演讲 我就想象他演讲时除了会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会有怎样的表情、风格和技巧，有心注意研究这一次他演讲的特点。

那一天不是他一个人讲话。除了“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李昌作了如何继承“一二·九”精神、积极参加抗战的报告外，还有王明和别的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毛泽东是第一个讲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讲话很口语化，语言很朴素，不加什么修饰，仿佛是在跟一个人谈话，那么自然，那么亲切，不用什么雄辩术，而是靠对事物透彻深刻的理解，就把听众说服了。他讲的道理似乎也很简单，但是越回味越觉得他的确讲出了很重要的思想。而且他讲话很风趣，有幽默感，听的时候一点不吃力。他的确是在作演讲，而不是在宣读什么文稿。如果是文稿，人们就会想，何必去听，不如去看稿子。而听他的演讲就不会产生这种想法。那次演讲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论点是，他把“一二·九”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比较，说它们都是为一次伟大革命作了准备：“五·四”为1925年的大革命，“一二·九”为抗日战争。又说“五·四”和“一二·九”都从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民运动。毛泽东在这个演讲中把“一二·九”运动和红军北上并提，指出了两者的结合促进了全民抗战。我虽然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但我并没有理解到它有这么大的意义。听后豁然开朗。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后来刘少奇也著文强调过。

访问人：您刚才说到，到会讲话的还有党的其他领导人。他们的演讲风格怎样呢？

于光远：在那个会上王明也讲了话，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在会上，当王明讲话时，我对他和毛泽东两个人的演讲作了一番比较。论文章，我是先读过毛泽东的，后来才读到王明的，而且一比就感到两个人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论见面，我在长沙局青委工作时就在王明的领导之下。抗战前在北平，抗战后在武汉，都有人对我宣传说王明的口才如何好，演讲如何精彩。可是有一次在武昌昙花林听王明演讲回来，我和蒋南翔走在一路，

我俩议论到 王明演讲很讲求词藻 注意演讲技巧 但是很浅 讲给中学生听听还可以，像我们这样的干部听了觉得没有东西。这次听了毛泽东的演讲 又把他同王明的演讲作了比较 更觉得自己过去对王明的演讲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在听这次演讲前不久我开始记日记，我把这种比较详细地记在了日记中。

在我这次对毛泽东和王明的演讲作比较时，我对王明曾犯过“左”倾错误还毫无所知。我那么分析完全是凭自己的感觉。因为在日记本上我发表了许多这类对党的领导人的议论，所以在整风开始时 我为了对党表示忠诚 把它交给了组织。因此现在也就无法引证日记原文了。

访问人 您跟毛泽东有过直接的接触吗？

于光远：刚到延安的人都有一个心愿——见到毛泽东。我去延安时，毛泽东才四十四岁。那时的毛泽东经常出席延安的各种集会。有一回我翻了翻延安《新中华报》发现每个月他都要出来作几次演讲。那时群众要见到他并不难。我到延安不几天 在延安东门外的飞机场就召开了一次人数最多的“追悼平江惨案被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后来收入毛选的《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会太大了 我站在远处没有看清楚他。这是 1939 年 8 月 1 日的事。在这个大会前十来天女大开学和在这个大会后十来天边区学联开代表大会，他都出席并讲了话。当时他和群众的联系非常密切。那时晚饭后大家都喜欢到延河边结伴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谈话 或者一边散步一边唱歌。毛泽东也常去散步，我就在河边遇到过他好几次。他散步通常只有一个警卫员陪着。有时我看到他和别人打招呼。有两回我都想走近他 跟他握握手。我相信 当时如果我那么做 警卫员不会阻拦，毛泽东也不会拒绝和我握手。不过我还是没有那么冒昧从事。我已经见到了他 听过了他的演讲 我并没有什

么话要对他说 也没有什么问题要他解决 因此我没有利用那样的机会去接近他。

我真没有想到 到延安只有半年 我就有机会坐在杨家岭他的窑洞里 离他很近 可以仔细地端详他的容貌和表情 听他讲话 握到他那肥大的手。

我去杨家岭 为的是同屈伯川一起向毛泽东汇报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 的筹备情况 请他出席二月初召开的成立大会。我们按时到了那里。那面窑洞很平常 窑洞里的家具也很简单 一张书桌 桌旁一把椅子 一个书架。另外两把椅子和一张茶几靠窑壁。书桌上放着文具、纸张和文件。我们进去时 毛泽东正伏在桌子上写字。我们一进去，他就停下了。屈伯川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 他答应到时候去 我们很高兴地得到了他的许诺。原先我们想他很忙 谈完了正事就走 没想到他很从容 听完了汇报，又向屈问起王人美在大后方的情况。他关心王人美能不能来延安。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王人美的父亲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之类的事。屈也真能够讲出一些这位电影女主角的情况。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只简单地补充了屈的汇报。我估计那次我没有给毛泽东留下什么印象，不过我倒是观察了他近一个小时。

访问人 很多人都曾讲到 在延安 毛泽东与人交往十分随和 有时甚至不拘小节 您觉得呢？

于光远 有一次 我见到毛泽东大笑 笑得很开心。时间是 1940 年 6 月 21 日，地点是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内的文化俱乐部的一面特大的窑洞里，场合是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的第一次会议 带有开幕式的性质。延安新哲学会是 1938 年下半年成立的。这个会成立时我还没有去延安，因此不了解这个会发起、筹备和成立后的工作情况。到 1940 年 6 月开这个年会时，中间已过了一年多。开这个年会时，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

洛甫、朱德都参加了。到会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有何思敬、艾思奇、郭化若、和培元、周扬、陈伯达、杨松、张仲实等不少人。在我的印象中有三、四十人 后来听说到会的有五十余人。是何思敬介绍我参加这个新哲学学会的。这是我参加延安新哲学学会的第一次活动 也是最后一次活动 也许以后这个会就没有活动过。)

引毛泽东大笑的原因是 延安新哲学学会的重要负责人(我不知道他的职务名称)何思敬致年会开幕词时,一开头便讲 在这个延安新哲学学会成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研究会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这成绩首先表现在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写了《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那样的著作。

他一讲 大家就笑开了 他越是一本正经 大家也就越觉得可笑。毛泽东也笑得直不起腰来。当时我脑子里闪了一下,领袖也可以这么笑吗 再一转念 领袖也是人 为什么不能同常人一样自由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呢?

大家都笑 只有两个人不笑。

一个是何思敬。大家那么笑 他有点发呆 似乎他还没有明白为什么大家笑,为什么毛泽东也笑。他还是照着他准备的稿子讲下去。

还有一个是艾思奇。他预定在何思敬致开幕词之后作会务报告。也许在他的“会务报告”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何的开幕词讲稿大概他也看过,他也笑不出来。后来我慢慢地熟悉了艾思奇的性格 他平常也偏于严肃不常笑。

当时,我也是跟着大家笑得很厉害的人中的一个。建国后,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常常遇到要我写理论工作总结这样的事情,也就常常遇到应不应该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同志在理论上的贡献写到总结里去的问题。我常常为这个问题左右为难。在我有了这样的工作经历之后,当时我也许就笑不出来了。

延安的纬度虽然比北京低两度，夏至的白昼还是很长的。这次新哲学年会下午二点多钟开始，散会时已经七点左右了，天还没有黑。会后聚餐，聚餐的地点就是文化沟口才开张的“胜利食堂”。五十余人如果都去，就得五圆桌，胜利食堂似乎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吃饭的人只有两、三桌。毛泽东也去了。一就座，我发现我同毛泽东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而且我紧靠着他，在他的左首。那次入座完全是随意的。没有人做什么安排。

在延安吃饭，一般干部都是自备两个大碗：一碗盛米饭，一碗盛菜，并且在胸前左侧平常插自来水笔的地方，插一支勺。那时，即便有极少数人吃小灶饭，也只是比一般干部好一些，两菜一汤而已。因此到馆子吃饭，自然是最高档次了。不过“胜利食堂”的烹饪水平只相当于今天北京街头的小饭馆的水平。有一点特色的是，在那里有一道甜食，那是用鸡蛋、面粉、白糖和食油制作出来的，吃起来一不粘碗、二不粘筷、三不粘嘴，延安人叫它“三不粘”。我看那天毛泽东的胃口也很不错。

坐得那么近，说话就很方便。他详细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学历、专业，是否党员，在延安哪个单位工作等等，并且跟我讨论哲学问题。

访问人：在这次“会面”中，你们谈了些什么？

于光远：在那天的会议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认为当时的抗战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进入了相持阶段，而只能说是进入了走向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我在发言中讲了事物发展有可能有过渡的形态、过渡的时期的一般哲学上的道理。我的这篇话引起与会同志的注意。因为1939年冬天，党中央已经说进入了相持阶段，毛泽东也以《相持阶段中的形势和任务》这样的题目在1940年2月发表过文章。因为是学术讨论，我还是讲了自己的看法。我讲了量变引起质变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复杂情况，我讲了过渡

的问题，也举了一些自然界的例子。我讲这样的话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与会的人除何思敬外，别的人大概都不认识我。在我发言时，毛泽东也很注意我。在餐桌上毛泽东就同我继续讨论关于‘过渡’的哲学问题。我讲了一些哲学家既要学社会科学，也要学自然科学的道理。这次餐桌上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向他交了一份党员登记表，也可以说是接受了他一次哲学口试。对如何看这个相持阶段问题，毛泽东没有表示他对我的看法的意见 我自己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之后 也没有再思考过这个问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需要作更加认真的考虑。看来毛泽东对一个只有二十五岁的青年也就不那么严格要求了。

到过延安的青年成千上万，能够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人谈话的人不会多。我得到这样的机遇 真是“三生有幸”。

1992 年 7 月 23 日于北京

难忘的教诲

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年轻党员对少奇同志怀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他们知道，是少奇同志纠正了当时年轻党员中由于幼稚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白区工作中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某些过火的行动，是少奇同志给他们的斗争以直接的正确指导，使运动得到健康的发展。他们从发表的文章中看到少奇同志对“一二·九运动”所作的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限于青年运动的发展，“一二·九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起着与红军长征和革命根据地斗争相配合的作用，这两件事标志着中国反动时期的结束和新的革命时期的到来。他们也感到少奇同志一直在关怀着这一代干部。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由少奇同志提名把在“一二·九”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李昌同志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作为这次大会的代表，我认识到这不仅表示他对某一位同志的看法，主要地是表示他对这一代青年干部历史贡献的又一次肯定。

这些只是从少奇同志和“一二·九”运动的关系来说的情感。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年轻党员对少奇同志的崇敬从根本上说当然因为他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因为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党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

功绩；因为他给我们后来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

我入党比较迟。1937年抗日战争的前夕我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工作时，才听说刘少奇这个名字。民先总队部党团（现在叫党组）是北方局领导的，但我没有见到过少奇同志。党的白区工作十分注意党的领导人的安全，每个党员能够接触的是直接领导自己的上级负责人，没有必要，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一般说来是见不着的。就是直接领导民先总队部党团的彭真同志，抗战前我在北平工作时也没有见过。1937年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我和赵德尊同志离开北平到保定，以民先总队部名义与全国各地民先地方队部和海外队部联系，继续开展工作。7月底北平沦陷，我从北平越过日寇占领的西郊到了保定，才第一次见到彭真同志。抗战前在北平的时候，我就知道少奇同志是北方局的最高领导，知道 K.V. 是少奇同志的笔名。以后又读到他用华云、陶尚行等笔名写的其他文章。这样的文章，得到一篇我就反复地阅读，感到每一篇文章都对斗争的客观形势以及我们斗争的目标、斗争的策略等讲得非常深刻、非常透彻，也很具体、很实在，使得我相信自己是处在一个坚强有力的人的领导之下，心里非常踏实。离开北平以后，在保定，彭真同志指示我去太原，要我在太原组织民先全国临时总队部。后来李昌等同志从北平到太原，民先总队部正式迁到太原，我被北方局和民先总队部派往武汉继续做民先总队部工作。在抗战开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中，在精神上我感到仍是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的，因而我一直有上面说的那样的心情。

我有幸和少奇同志见面直接听取他的教诲，是在1947年。这年年初我参加了一个只有十多个人组成的“中央土改工作团”。我们在晋绥保德县新畦村搞了一期土改之后，到了河北平山县，选择了滹沱河边的一个大村贾峪，进行土改试点。1947

年3月中央决定以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解决土地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与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指导各解放区土改迅速地健康地发展，是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一项中心任务。中央工委的所在地是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少奇同志就住在这个村庄。贾峪村与西柏坡村非常近，中间只隔一个东柏坡村。从贾峪村到西柏坡村步行要不了半小时。由于这个地理条件更由于我们在贾峪村的工作带有为全国土地会议作准备的性质，我就有比较多的机会见到少奇同志，听到他的工作指示。接着我又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个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这个会开得很长，从7月17日到9月开了将近两个月。在会上少奇同志多次发言和插话。听他的讲话，常常唤起我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阅读 K. V. 文章时的印象。

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我继续在贾峪村按照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进行土改。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其他同志也在西柏坡附近其他村庄工作。中央工委把贾峪等村作为研究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试点。少奇同志经常注意这些村庄的土地情况。10月19日，少奇同志在西柏坡住房里接见了“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全体成员。我们这个工作团的成员提出不少问题。对每一个问题，少奇同志都作了详细的答复。我对这次长篇谈话作了记录。在这次谈话中他不仅对平分土地的政策作了进一步透彻的说明而且对以后实行人民代表制度讲了许多具体的设想。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农村中的经济制度，也发表了他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这次谈话对于研究少奇同志的思想，是一个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材料。

我想对这次谈话中讲的一个问题作一些介绍。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一些特点。

在那次谈话前 我在贾峪的工作中了解到 对土地法大纲中提出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 干部和群众思想不那么通 要求给地主、富农少分土地的思想很强烈。在那次会议上我向少奇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向他请示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少奇同志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说：“平好 不好反驳 不好反对 毛病最少。群众一定要保持某种不绝对平，则也可以允许。但如果有争论 仍以‘平’来解决问题 在平分土地时 要给地主富农留得同样一份土地。”这段话经过他一解释 我就觉得充满着辩证的思维。他说：“南庄 西柏坡南的一个村 地主百分之八十是抗属家属。如果我们的老子饿饭，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当权的政党 对和尚、尼姑、婊子都要负责 对地主、富农也要负责。给地主、富农分一份土地 不是照顾地主、富农 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要坚持法令解决问题，不能说应该不平一些。因为我们是做领导工作的 如果我们说可以不平一点 可以不按法令办 那就变动大了。”这些话 讲的是原则。但是少奇同志是非常讲求实际的。他接着说 如果“老百姓硬是不赞成平 实在要少分一些地给地主富农 可以依百姓的决定 但是我们应该声明 我们的方针是‘平’，‘不平’是你们的主张 不是我们的主张。因为我在这里 我可以替你们负一点责任 但这是你们做的 不是我们做的。”这就是“群众一定要保持某种不绝对平”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 既要坚持原则 又不能勉强群众接受我们党的主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少奇同志是十分重视农民利益的，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他还从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来看党坚持平分土地政策的好处。他说 如果这个村是“贫雇农当权”在这种场合下 我们坚持“平”这个原则“不必主张不平 地富仍然会少分到地 贫雇农仍然会多分到土地 如果地富及其走狗当权 我们不坚持法令 允许一些不‘平’ 那就一定是

地富多分”。他还说：“即使在贫雇农当权的地方 我们也不要提可以不平 因为这样做 破坏了法令的严肃性”。

还有一件事 我想特别讲一下 因为它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上一次谈话后不久，当我们中央土改工作团即将离开平山继续向东往冀中渤海等地的时候 我考虑到 按照党的工作方法 我们这工作团虽然是中央直接领导的 而且在团员中有不少是革命历史很长、地位较高的老同志 象我这样年轻的同志只有四个人（其中一位是毛岸英 他比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年轻同志又小几岁）但是到地方去工作 仍然要在当地党组织 比如在地委、县委领导下进行某一个村、某一个乡的土改工作 因此可能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它发出的指示不正确 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 我就约另外一位年轻同志去西柏坡，闯进少奇同志的住所，提出了一个“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一次 少奇同志对我们说的话虽然不多，可是我记得非常牢固。我觉得所讲的那个道理对我很有用处。少奇同志听我把问题提出来之后，略为思考了一下说：“你们不要一般地、抽象地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好处。国民党的法律 从表面上看 对地主和农民也还是‘平等’的 但是县政府在办案时 如果地主告状 他们就雷厉风行 没有官僚主义 如果农民告状 他们就搞官僚主义。这样地主就会感到这个县政府、这个衙门是自己的。现在我们搞了一个《土地法大纲》。在这个《土地法大纲》面前，地主农民也是‘平等’的。地主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土地法大纲》到我们县政府告农民的状况。在地主到我们的县政府来告状时，我们就可以搞点官僚主义 而农民来告状时 我们的政府就一定要雷厉风行。这样，农民就会感到我们的县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我觉得这一段话讲得很精彩。接着他还讲了一段给我留下

印象最深刻、记得更牢固、在以后工作中对自己更有意义的话：“你们在中央土改工作团做了半年来工作，又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中央精神你们是很了解的。你们也有自己的脑子，可以去分析、去判断你去的那个地方的党组织的某些指示是不是官僚主义的。你们应该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知道哪些指示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是官僚主义的。如果你作出了这样的判断，那么你们就不应该把这些指示当作党的指示，而应该视作官僚主义的‘指示’。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以向地委、县委讲自己的意思，提自己的建议。但是你们也要有精神准备，尽管你们反对，也不能把人家的官僚主义的指示反对掉。而且，你们也不好老提意见嘛！老提意见也不一定合适。即便如此，你们也要注意不能把他们的指示奉为神明、坚决去贯彻它。你们如何去处理才得当，这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地去处理。而且要做好，也许不那么容易，要看你们的本事。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决不要把官僚主义的指示奉为神明去贯彻。如果你们那样去做，你们自己就成为官僚主义者了。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作为嘛。”这一段话我一直记在心头，不敢去做那种把官僚主义的指示奉为神明的官僚主义者。可惜的是，那时我没有做记录，他讲得比我记得的还要多些，但是上面那些我是记得非常清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和改革相适应，我们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要有很大的转变。现在，那种对工作不负责任，只要是上面来的“指示”，尽管明显地与中央精神不符合，是官僚主义的东西，也机械地执行的现象是很盛行的，因而使官僚主义得不到抵制。看到这种情况时，我常常想到少奇同志的这一席话。

1988年3月作

忆周总理

今年 3 月 5 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总理生前，我同他老人家有过多次接触，在一段时间内，总理曾直接领导过我工作。总理的音容笑貌、平易近人、远见卓识、忘我的工作精神，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在他诞辰百周年之际 特撰写短文 表示我对他深切的怀念。

在太原听周副主席演讲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 1937 年 8 月上旬 地点是太原。

抗战前 我在北平民先总队部负责组织工作“七·七事变”后党组织决定我离开北平到保定设立临时总队部，与全国民先联系 而原先总队部的队长李昌等在北平坚持工作。到保定 彭真同志要我把临时总队部迁往太原。于是在 8 月初我就在太原建立起民先临时总队部。我当临时总队长，并开始工作。就在这时候，八路军开始从陕甘宁边区过黄河向晋东北与河北察哈尔接壤的地区开拔 部队要经过同浦路太原车站 但不在太原停留 战士们只是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休息一阵 吃点东西 接受群众的慰问之后，就继续北上，因此在太原城内除了首长的警卫

外看不到一个八路军战士 只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在太原城内停留，他们要同国民党山西当局接触商量事情。

在太原城内的几个革命群众团体，其中包括我们民先临时总部和山西省地方队部，得知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别的几位将领正在太原城内，就决定联合起来邀请他们向太原城内的群众发表演说。

这次演说完全是几个民间团体组织的，没有山西官方的人士参加，地点很可能是成城中学的礼堂。那个礼堂的舞台不大，观众只能站在舞台的两侧和台前。整个礼堂很小 没有座位 站着也只能容几百人。太原的群众尤其是青年听说周恩来演讲，都踊跃参加 尽管我们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那天到会的人仍有一千以上 礼堂挤得满满的 但是秩序很好。

演讲的时间是在晚上。那时日本飞机常去太原空袭，实行灯火管制，不敢亮电灯，而是在舞台的栏杆上点起几十支蜡烛，总算可以看出演讲者的容貌和表情。周恩来那时三十九岁，在长征时蓄起的长胡须已经刮去了，显得非常英俊。他讲的主题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演讲中讲在山西当局的合作下，准备与山西当局和各界人士一起抵御日寇向山西的进攻。他声音宏亮 那时没有麦克风 但是他讲的话在礼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那次演说中有一段话，给我印象最深刻最强烈，那就是他讲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为了准备与日军作战，前一年曾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界，可是有人不许我们抗日，进行阻拦。而阻拦红军东进抗战的不是别的军队，正是阎锡山统率下的军队。讲到这里 周恩来提高了嗓门 讲“那时红军为了开到抗日前线 被迫同你们的阎司令长官决一死战。”然后他接着讲现在形势变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 八路军已来到山西 开往前线与日军作战 希望得到山西